

商代的玉石文字

陈志达

殷商时代，琢刻或书写在玉石器上的文字，为数不多，主要出土于安阳殷墟，其次为传世器，个别的出土于甘肃省。由于资料比较分散，查找不易，而某些铭辞，对研究殷代的礼制、方国关系等问题有一定意义，故辑录于此，并就器物的年代、占有者身份等问题加以探讨，以求正于同志们。

据我们蒐集到的不完全资料，商代玉石文大约有20多件（未计玉璋残片），其中约23件为刻文；2件为毛笔书写。按其内容，大致可分两类。

一、纪事性铭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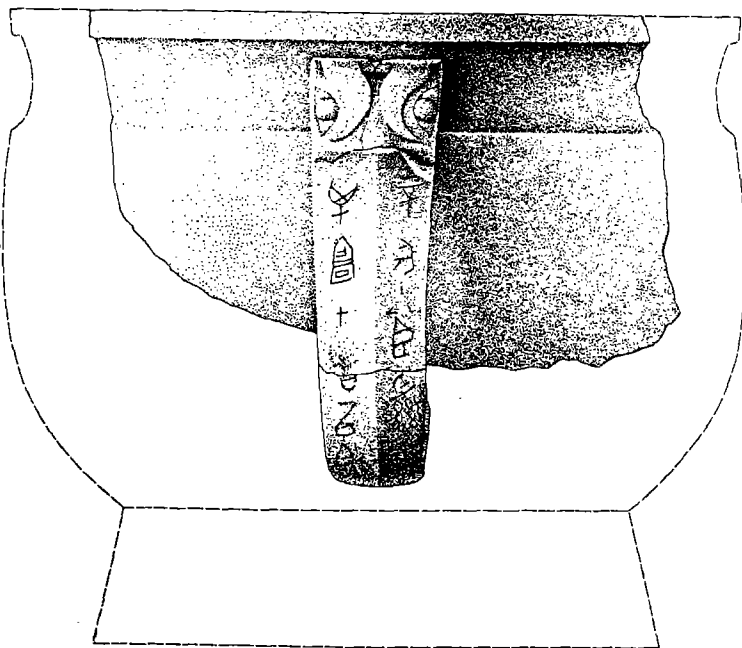
多数辞意清楚，内容有祭祀、入贡、战争等，从一个侧面，反映了殷王朝的一次历史性事件。如：

三十年代出土于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代

王陵区HPKM1003大墓的一件残石殷^①，复原后为侈口方唇，折肩圆腹，两耳作半环形，全高约13厘米。在殷一耳的外壁琢刻文字两行，共13字，文曰：“辛丑小臣𠄎（系）入（右一行）

𠄎（禽）𠄎（俎）才（在）𠄎（以）殷（左一行）”（图一）。这篇纪事性刻辞，高去寻先生曾作过详尽考释^②，并将内容译成现代汉语，大意谓：在辛丑日，有小臣𠄎的“入𠄎”（入𠄎”可能是献俘），乃在曹地举行𠄎礼的祭祀，这件石殷便是祭祀所用之器。并认为𠄎祭者和殷的所有者是殷王。据胡厚宣^③、陈梦家^④二先生考证，殷文铭刻属帝乙、帝辛时期。

HPKM1003是殷代王陵区八座带四条墓道大墓中的一座，规模宏大，惜乎遭到古



图一 石殷及耳上的铭刻（M1003）

今盗掘，出土遗物已寥寥无几，但从墓内出有短胡一穿的铜戈考察，一般多认为此墓的年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，相当于帝乙、帝辛时期。有的同志认为，王陵区西区与M1003相邻的一座方形坑（M1567），是帝辛未修成的墓^⑤，那么，M1003可能就是帝乙的陵墓了。

殷铭中所称的“小臣”，屡见于甲骨文与铜器铭文。胡厚宣先生认为“小臣之官当给事于殷王左右，居一重要之职位”^⑥。陈梦家先生也认为“臣或小臣在殷代为一般较高的官名”^⑦。他们的论证，无疑是正确的。

刻有“小臣”称谓的玉石器，在传世的玉器中也有所见。如《古玉图录》卷四·十一页著录有一件柄形饰（或称柄形器），形制与妇好墓出土的I式柄形饰相似。在柄端下侧的一面阴刻文字两行，共十一字，文曰：“乙亥王易（赐）小臣鷩（右一行）鬯才（在）大室（左一行）”。字迹多数清晰，唯“臣”下一字不甚清楚。“鷩”可能是人名，“鬯”是器名；也可能“鷩鬯”是人名。“大室”见于甲骨卜辞和金文，是一种建筑物的名称，据研究是藏庙主之所在。大意是说，在丁亥日，殷王在大室赐小臣“鷩”一件称为“鬯”的东西；或者解释为，在丁亥日，殷王在大室赐小臣“鷩鬯”一件东西（柄形饰）。“小臣”受王之赐，刻文以志其事。此铭文辞例与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戊嗣子铜鼎的铭文相近^⑧，但较简略。结合刻文的字体，我们认为柄形饰的年代属于乙、辛时期。

《古玉图录》卷三·十三页著录有一件长条形小玉器，上刻“小臣妥”三字，阴刻。“妥”当系人名。其用意大概是刻以志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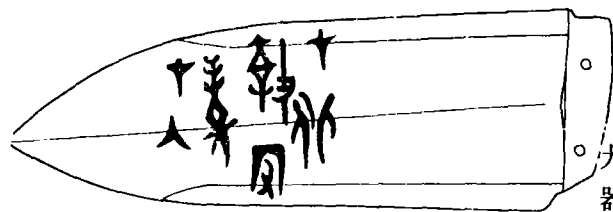
安阳小屯村北发掘的妇好墓^⑨，出土的玉石器（包括宝石器）达865件，经整理观察，发现其中三件刻有文字，内二件系纪事性刻辞，一件是大玉戈，制作精细，全长38.6厘米。在戈内的后部一面刻有“盧方𠄎入戈五”六字，由上而下排列，阴刻，字迹纤细。

“盧方”当系方国名，见于甲骨卜辞。在卜辞中，“盧方”亦称“盧方伯”或“盧伯”，如《小屯南地甲骨》667片有“……盧方白𠄎王派？大吉”字样，由于是残辞，含义不清楚。“𠄎”字刻文不很清晰，可能是人名。“入”有贡纳之意。“戈五”二字合文。大意是说，盧方的𠄎入贡戈五件。据我们观察，在同墓所出的39件玉戈中，内有四件与刻文戈的形制与玉料都比较接近，推测有些或许同是盧方𠄎入贡的。

由上例的戈文分析，大概在武丁统治时期，“盧方”与殷王国的关系比较友好。可能到了殷末，“盧方”叛殷，据《尚书·牧誓》称“（周武）王曰，嗟！我友邦豕君、御事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亚、旅、师氏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鬻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。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”。这里所称的“盧”，有的学者认为即是“盧方”，它参加了周武王讨伐殷纣的战争^⑩。至于“盧”的地望，有的认为在今河南、湖北一带^⑪；有的认为在今湖北襄阳南，即春秋时的盧戎所在地^⑫。


另一件是妇好墓出土的长条形石磬。磬顶端中部有一圆穿，全长44厘米。在磬的一侧上端刻“妊冉（或释竹）入石”四字，阴刻，字迹清晰。“妊冉”可能是族名或人名，“入”即贡纳，“石”指磬。就是说，妊冉入贡了一件石（磬）。可注意的是，此磬与殷墟出土的一种近三角形的磬形制迥异，可能是妊冉族的固有磬制。

安阳小屯村北的一座殷墓（M18）中，出土有一件绿色玉戈，长援短内，内上下各有一穿，表面光滑，全长20.5厘米。在戈援一面的前端发现有朱红色文字，出土时字迹大部清晰，仅一字模糊，用毛笔书写“在泚𠄎𠄎在入”七字（图二）。“在”字之前，有一残字，但已不清。据研究，此戈上的文字，可能是殷王国在泚与“𠄎”、“𠄎”战争获胜后所书，也可能是专制此戈并书记其事^⑬。象这样的朱书玉戈，在殷代极少见，










图二 玉戈 (M18: 46)

可说是一件难得的珍品。

小屯M18与妇好墓相邻，东西相距约22米，圻穴虽小于妇好墓，但比殷墟一般长方竖穴墓为大。有棺有椁。有殉人五具和殉犬两只。墓主人经鉴定年龄为35—40岁，近似女性。墓内出土有铜礼器24件、铜戈9件、铜镞10枚、玉器11件以及骨器、海贝等。在铜礼器中，发现有“子渔”、“侯”等铭文，而“子渔”为第一期卜辞中常见的人物，可见墓主地位的重要。发掘者认为，此墓墓主可能是殷王室的成员，墓葬的年代属殷墟文化分作四期中的第二期，大致与妇好墓同时，这是很正确的。由于玉戈上的朱书，内容与战争有关，而墓主人的骨骼又近似女性，我们设想，此墓墓主可能也是一位女将。


此外，朱书文字在玉璋残片上也有发现。据有关的发掘简报说^⑭，安阳铁西区刘家庄南地的殷墓群中，出土了不少玉石璋残片，其中有些留有朱书文字，但内容未作具体报导。






纪事性刻辞的另一例也见于玉戈上。此戈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，戈长22.9厘米，在援的后部由上而下刻有十个字。李学勤先生曾就实物作过仔细考察，断定为真器真铭。铭文经他隶定和考释，文曰：“王大乙，才（在）林田，夙”。李先生指出，“”是助词，“”有侍奉意，“王大乙”即汤，“”为人名，“”字象人踞坐执戈而侍。他认为这件玉戈是在这次祭祀大乙的过程中在旁侍奉，可能当时手持此戈，因而事后刻铭留念；而这件玉戈应该看作与征人方有关的器物之一^⑮。这种具有祭祀内容的铭刻，在商代玉石器中目前仅此一见。


二、方国名或族名、人名及其他

此类内容比较复杂，有些则难明其确切含义，有待学者们探讨研究。



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HPKM 1001大墓翻葬坑出土了多件刻有一至两字的玉石器^⑯，计有：

一件淡绿色杂棕斑的残玉斧，在其一面刻有一倒置的“”字。斧残长5.15厘米。

“”见于甲骨文和金文，如“乙巳卜贞眾雀伐羌祸”（粹1167片）；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大圆鼎和两件铜铙上分别铸有“亚”铭文。据陈梦家先生研究：“和雀则是殷国的邦侯，二邦相当邻近，故于一辞卜两邦伐羌”^⑰。他在另一处提到雀的地望时，认为“当近豫西”，由此推知，也可能在今豫西一带。

另一件残玉斧，淡绿色与棕色相杂。残长8.4厘米。在斧的正面刻有倒置的“侯”二字，“侯”字下半残缺。某侯或侯某，在甲骨卜辞中屡见，陈梦家认为“侯、白（伯）受殷王的统制，有交纳其农作物与其出征的义务，……”^⑱。

一件大理石虎面饰，正面微凸，雕一大眼巨眉咧口的虎面，下部刻有一头两身的虎，阴线双钩。背面中部有一“右”字刻文。高21、厚4.6厘米。报告作者认为可能是镶嵌在木柱上的“浮柱饰”。其说似可信。

此外，还出土有较多的近方形或长方形的大理石镶嵌片，嵌片一般长五、六厘米，而在某些镶嵌片的一面分别刻有一个字或一个符号，能识别的有“母”、“五”、“止”、“苦”等字以及“”、“”符号。由于镶嵌片均与主器脱离，已无法知道主体的形制与用途，嵌片上文字的含义，已难以弄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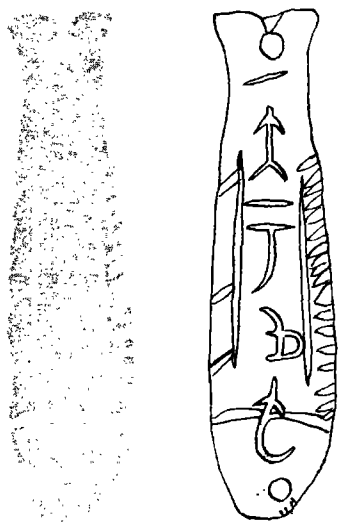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HPKM 1001大墓的年代，学者们多认为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或殷代早期，大致与妇好墓的年代相当。墓主应是殷代早期的一个王，但究属那一个王的陵墓，仍难作出准确判断。

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大理石圆雕卧牛，出土时放置在墓距口深5.7米椁顶层中部，

头向南，雕琢精致，长25厘米。在石牛的下颌上刻有“司（或释后）辛”二字。联系到同墓中出有“妇好”和“司母辛”铭文的铜器，我们认为，“辛”应是妇好的庙号，此牛有可能是武丁为祭祀或纪念其配偶妇好而作。由于石牛放置在墓室内的显著部位，有的同志曾说，此石牛与后世墓碑起同样的作用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
在传世品中，有三件石磬，形相近，均有一圆穿。在磬的一面穿之右侧分别刻“永攸”、“永余”、“天余”字样^⑩。于省吾先生定为商代之器，可信。“永攸”、“永余”、“天余”象是作器者的私名。

三十年代，安阳小屯村东北地殷代宫殿宗庙区Y M331 出土的一组编珠鹰鱼饰，由一枚雕鹰玉笄、十七条玉鱼和一八一颗绿松石珠组成，发掘者推测：“把这三种东西配合起来，可以造成一个很美丽的头冠”^⑪。这一看法应是可信的。可注意的是，在上述的十七条玉鱼中，其中一条的鱼身一面刻有“大示它”三字（图三），耐人寻味。



图三 玉 鱼 (YM331)

“大示”、“小示”在甲骨卜辞中屡见。据陈梦家先生研究，“立于宗庙的先王的神主，称之为示”，“大示”是直系先王，“小示”包括旁系先王，又说，凡大示所集合之处名“大宗”，小示所集合之处名“小宗”^⑫。

据此，玉鱼上所称之“大示”，当指殷王室的直系先王。“它”有“祸患”、“为祟”义。玉鱼刻文可以理解为殷直系先王将为祟于或祸患于某人（可能指墓主）。墓主佩戴此饰物，似有自我儆戒之意。

小屯Y M331 的圻穴虽不大，但有六具殉人和一只殉犬，出土随葬品也较丰富，计有青铜礼器、武器共26件、玉石器80多件，白陶器、骨器等20余件，以及海贝一堆^⑬。联系到玉鱼上的刻文，我们推测，此墓墓主可能是殷王室的一个直系成员。

关于Y M331 的年代，多数学者认为属于殷墟文化第一、二期或殷代早期。具体地说，此墓的年代应早于妇好墓，略晚于小屯Y M333、Y M232、Y M388 诸墓。另外，在这座墓的填土中，出有一片字体近似“自组”卜辞的甲骨卜辞（《乙编》9099）。由此我们认为，将此墓的年代订为武丁早期，似较恰当。

甘肃庆阳县野林大队出土的一件玉戈，在援的一面阑之前方中部竖行阴刻“乍曾𠄎”三字^⑭。“乍册”见于甲骨卜辞和金文，陈梦家认为是“史官”^⑮，“𠄎”应是人名。大意谓此戈系史官𠄎所有。此戈制作较精，内上琢雕兽面纹和圆圈纹，全长38.6厘米。其形制与妇好墓出土的I式玉戈接近，年代可能亦相当。

传世的一块玉甲子表残版，灰青色，据说出土于安阳。玉版残存“庚寅辛”三字，阴线双钩，“庚辛”二字泐伤。据研究，甲子表原由六片组成，此残版为第三片，文字为第二行^⑯。但在殷墟发掘中，始终未见甲子表的踪迹。此残版可备一说。

一件传世的绿松石燕形珮，作俯视展翅形，喙部有一孔，可佩带。长4.4、宽2.5厘米。在燕的腹面有一“田”字。有的同志认为，“田”是“田猎获燕后的记录”^⑰。

一件传世的长方形残玉片，在后段的一面有朱书“𠄎于丁”三字^⑱。“𠄎”可能是族徽，“丁”是日名，大概是“𠄎”族为祭

祀或纪念“丁”而作。从残片观察，象是玉戈的残块。

此外，安阳苗圃北地一座殷墓中出土的一块长方形磨石^③，三面刻有数字符号，可辨出的有六组，每组由六个数字组成，如一组为六六七六六八；二组为七六七六六七。一般多认为此种符号是易卦的卦象。由于它已不属文字的范畴，故从略。

殷商时代的玉石器刻文，尽管数量不多，但内容的牵涉面较广，结合刻文的器类、出土单位等问题，我们作如下的归纳：

第一，从铭刻内容看，有纪事、方国名或族名、人名、官名以及其他等，或刻或写，而以刻为主，但它们的内容没有一件重复的，这与甲骨文、金文有显著区别。由此反映出殷人以及方国统治者在刻写铭文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

第二，被刻写的玉石器，主要为礼乐、祭祀和仪仗用器（如石殷、石磬、玉戈等），也有少量动物雕像（如石牛）和装饰品（如柄形饰、玉鱼、绿松石燕等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殷人对礼仪、祭祀制度的重视。

第三，在殷墟，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具有铭刻的玉石器，大多出土于殷代王陵和王室墓，按殷墟文化的分期序列，以第二期（武丁晚期至祖甲）佔较大比例；第四期的仅一例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出武丁时期在琢玉工艺、文字书写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；同时，也反映了殷代王室对刻文玉石器的占有程度。

殷商时代的玉石器文字，是当时玉石工艺、书写艺术、社会意识各方面的综合体，是商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份；对于后世的玉石器铭刻无疑也有深远影响。

从现有资料看，我国的玉石文字或符号，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，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传世大玉琮，上刻“&”字样^④。殷墟文化时期（商代后期）玉石文已相当成熟，但早于殷墟文化的二里冈商文化和更早的二里头夏、商文化遗址中，未闻有玉石文的出土，我们推测，这

可能与没有发掘到大墓有关。

注释：

①梁思永、高去寻：《侯家庄第四本·1003号大墓》图版贰柒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，台湾台北，1967年。

②高去寻：《小臣兹石殷的残片与铭文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八本下册605页，1957年。

③⑥胡厚宣：《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农业》，《甲骨学商史论丛》二集上册69页，齐鲁国学研究所出版，1945年。

④陈梦家：《殷墟卜辞综述》507页，科学出版社，1956年。

⑤杨锡璋：《商代的墓地制度》，《考古》1983年第10期。

⑦同注④，505页。

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发掘报告》图一九八（乙）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。

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妇好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⑩⑪《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》（石志廉先生的发言），《考古》1977年第5期347页。

⑫屈万里：《尚书今注今译》72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9年。

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1年4期505页。

⑭安阳市博物馆：《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86年第3期。

⑮李学勤：《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12期。

⑯梁思永、高去寻：《侯家庄第二本·1001号大墓》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，台湾台北，1962年。

⑰⑱同注④289页，331页。

⑲于省吾：《双剑谿古器物图录》卷下十七页、十八页、十九页，北京大业印刷局，1940年。

⑳石璋如：《殷代头饰举例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八本下637页，台湾，1957年。

㉑同注④643页。

㉒石璋如：《小屯殷代丙组基址及其有关的现象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，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》，台湾，1961年。

㉓许俊臣：《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2期93页。

㉔同注④518页。

㉕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：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》图版176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。

㉖同注⑤图版178。

（下转64页）

⑥2 王永波：《牙璋新解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8年第1期。

⑥3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：《中国大百科全书—考古卷》图版一九：1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6年。

⑥4 牟永抗：《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》，《玉器鉴定训练班讲义》油印本，1982年。

⑥5 曲石：《两周玉器》，《考古学集刊》，待刊。

⑥6 付宪国：《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》，《考古》1985年第9期。

⑥7 杨泓：《中国古兵器论丛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⑥8 赵汝珍：《古玩指南》，中国书店，1985年。

⑥9 汪遵国：《琮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》，《江苏社联通讯》1980年10月第13期。

⑦0 冯汉骥：《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》，《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⑦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：《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

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1期。

⑦2 夏鼐：《所谓玉琮不会是天文仪器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4年第4期。

⑦3 王明洪：《山东海阳县史前遗址调查》，《考古》1985年第12期。

⑦4 曲石：《为琮机正名》，《文博》1988年第5期。

⑦5 吴大澂：《古玉图考》序，上海同文书局，1889年；罗振玉：《释爱》，《永丰乡人甲稿（雪窗漫稿）》，贻安堂刊本，1920年。

⑦6 张永昌：《古玉鑑定》，《玉器鑑定训练班讲义》油印本，1982年。

⑦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：《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7年第10期。

⑦8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：《沈阳市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5年第12期。

⑦9 陈志达：《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12期。

（上接110页）

水平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，粮食除满足当时人们生活外，还有剩余用于储藏和酿酒。同时这里还设置有城和城壕，因此该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，可能是一定范围内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这对探讨河南龙山文化的性质又提

供了新的资料。

（摄影：王蔚波）

注释：

① 曹桂岑、翟继才：《鄆城县郝家台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》，《中国考古学年鉴—1987年》第178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10月版。

（上接69页）

②7 《邶中片羽》第三集卷下二七页，1942年。

②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1980—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

1986年第2期。

②9 石志廉：《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1987年10月1日，第57期。